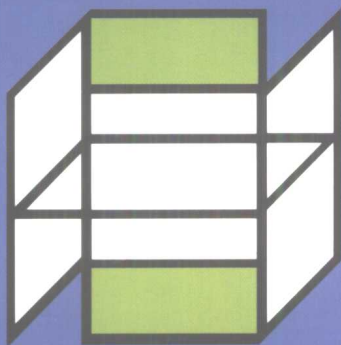


丛书主编 俞可平 副主编 薛晓源



Third Way and New Theories

“第三条道路”

与

新的理论

杨雪冬 薛晓源 /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之一

俞可平 主 编 薛晓源 副主编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杨雪冬 薛晓源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杨雪冬,薛晓源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之一/俞可平主编)
ISBN 7-80149-230-7

I.第… II.①杨… ②薛… III.社会制度—研究 IV.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323 号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之一·

“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



主 编:杨雪冬 薛晓源
责任编辑:肖彦 森 林
责任校对:同 文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8.125
字 数:193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5001-8000

ISBN 7-80149-230-7/D·035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做学问需静心专一，脚踏实地，锲而不舍。所以古人说：“若要做得学问真，须坐板凳十年冷”。这里说的是，做学问的心境，或者说研究态度，需要冷和纯。然而，研究态度要冷和纯，并不意味着研究的问题也非冷和纯不可。做学问固然不像抢新闻，学者也不能像记者那样去抢热点赶时髦，但关心学术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却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应当具有的品质。

从古到今，我们一直把学问分为显学和隐学。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相反，隐学则是离现实较远，不那么为世人瞩目的学问。在许多人眼中，显学的学术含量似乎要比隐学少一些，甚至某种研究一旦成为显学其学问似乎也不那么纯了。其实大为不然，显学和隐学同样都可以做出大学问。

显学是与现实关系密切的学问，它与学术前沿问题通常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前沿问题，指的是那些代表学术的最新发展、已经引起或者即将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重大问题。紧扣学术的前沿，把握学术的脉搏，领导学术的潮流，正是古往今来许多学术大师的一个共同特点。例如，被认为是“当今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哈贝马斯，他一生的学术轨迹几乎与最前沿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休戚相关，他先后深入研究过合法性问题、交往（沟通）理论、现代性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和全球化问题等，并且在这些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了解和把握学术前沿问题对于学者来说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反映了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趋势，预示了这些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学术前沿问题并不是忽然冒出来的，它必然有一个知识的积累和演进过程。例如，本丛书论及的“全球化”、“治理”、“社会资本”和“第三条道路”等，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它们之所以成为现时代的学术前沿，是因为这些学术理论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对社会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在整个学科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所以，了解学术前沿问题，是把握整个学术潮流，理解当代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追踪国际一流学者的思想轨迹的一条快捷之道。

每一个学术研究领域都有其自己的前沿问题，我们无意也不可能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沿问题一一收录于丛书中。本丛书收录的这些学术前沿理论，大多都是90年代后逐渐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并正在对国际社会科学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事实上还刚刚起步，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各国学者在下个世纪初所关注的热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将是新世纪的学术话语。

俞可平

1999年7月28日

编者的话

从1997年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在英国大选中获胜以来，“第三条道路”成了西方政坛非常时髦的口号。而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多个国家的重新执政不仅带来了一个“玫瑰色”的欧洲，而且似乎证明了“第三条道路”的成功。难道“第三条道路”真的给从出生以来就带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的西方资本主义指明了一条新的、充满光明的出路吗？

在媒体主导的时代中，宣传的放大化和舆论的单向性往往会造成一个又一个“神话”，不动声色地确立为自我利益辩护的话语霸权。从某种意义上，“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会所做的回应和努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不单单是一个煽情的政治口号、一种暂时的现象，而是一个折射出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从70年代以来已经发生的变化、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变化的多棱镜。

我们认为，及时、客观、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的最新变化、特别是理论界在西方主流社会中的作用，无论是对于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具有战略意义。在这个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中，排斥、漠视以及扭曲都不是合理的选择，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来加以分析和批判。

因此，为了帮助学界同仁和从事实际工作的朋友了解西方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第三条道路”的回应以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组织编译了这个论文集，希望它能够比较全面地勾画出“第三条道路”的轮廓，为读者提供一些原始的资料。

编者

1999年9月

目 录

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	杨雪冬（1）
-------------------	--------

第一章 政治家的构思

第三条道路·····	[英] 托尼·布莱尔（25）
新民主党的希望·····	[美] 比尔·克林顿（28）
老左派与新中派·····	[德] 格哈德·施罗德（34）
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	[德] 奥斯卡·拉封丹（39）

第二章 理论的探讨

左派瘫痪之后·····	[英] 安东尼·吉登斯（61）
处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	[英] 安东尼·吉登斯（69）
还有选择·····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78）
在历史的起点上·····	[意] 诺伯托·博比奥（89）
第三条道路与自由：欧洲新中派的威权主义	

色彩·····	[英] 拉尔夫·达伦道夫（98）
认同政治与左翼·····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105）
放弃中间	

——安东尼·吉登斯为第三条道路设计的

路线图激进含义·····	[英] 斯蒂文·卢克斯（119）
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统一的、温和的左派	
·····	[英] 唐纳德·萨松（126）
被背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	[法] 伊格纳西奥·格莫内特（139）

新的中派和第三条道路 [法] 丹尼尔·本沙德 (142)

第三章 英国：争论的焦点

第三条道路

——答布莱尔 [英] 帕特里克·哈林顿 (149)

工党政府：旧的制约与新的参数

..... [英] 戴维·科茨 (164)

新工党和英国政治重组 [英] 西蒙·肯尼迪 (186)

第三条道路的致命之处

..... [英] 查尔斯·里德比特 (199)

第三条道路上的两个车道

..... [英] 戴尔米德·怀尔 (205)

第四章 核心之外的影响

第四条道路？对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替代

..... [墨西哥] 露西·康格尔 (219)

第三种左派的基本价值

..... [芬兰] 简·奥托·安德森 (230)

第三条道路：新路还是旧途

杨雪冬

“冷战”的结束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短暂的狂喜，“历史终结论”正是这种抑制不住的喜悦情绪的流露。然而，狂喜没有持续多久，整个西方世界很快恢复了平静，陷入反思之中。因为一度被苏东国家巨变的历史背景所掩盖的自身问题开始逐步显露出来，被新自由主义奉为主臬的市场化不仅不能彻底解决积重难返的苏东问题，而且在应付资本主义在 globalization 时代遭遇的内部问题时也捉襟见肘。西方左派在度过了休克打击带来的混乱和消沉后，逐渐复苏，重新确立目标和口号，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疲惫和乏味，在西方政坛卷土重来，有的还重新执政，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派发展的新高潮。“第三条道路”就是西方左派为了把自己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区别开来，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而量身定做的标签。这个标签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西方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尝试努力，折射了 9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变迁。

一、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 变化的宏观背景

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声称处于左右之间或者超越了左右界限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有许多种。如哈罗德·麦克米兰在 30 年代主张的人道的资本主义，40 年代拉斯基等人提出

的“新工业化”，50年代社会党国际追求的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道路，60年代东欧国家提出的人道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等等。这些运动或思潮在当时都曾经引起轰动，有的还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它们虽然与90年代鹊起的“第三条道路”没有什么联系，但都说明了西方世界在进入现代以来一直处于二元对立的紧张状态。当然这种二元状态可以追溯得更远。然而，在现代，这种二元紧张一直表现为几大主义间的对立。以往寻求中间路线的尝试与目前的“第三条道路”至少有两个表面上的明显区别。一是以前的这些尝试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主义之间进行的，这两大主义是界定这些尝试的“中间性”的坐标。而“第三条道路”的出现则是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基本结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被摒弃后出现的，是后冷战时代的产物。其寻求的中间路线是要超越传统左派（即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者），也包括极端自由主义者。二是这些寻求中间突破的努力在时代背景上有巨大区别。如果不把“第三条道路”放在宏观的时代背景下来审视，就无法全面深入地理解它出现的原由、意义以及它与以前的尝试之间的深刻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在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这个时代发生的诸多变化与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变化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①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结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出现提供了更广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被突然的打击冲乱了阵脚的左派很快意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对自己的崛起是个大好机会，他们不仅可以把苏联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且可以彻底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务实些，多元化一些。他们的努力与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中出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和所谓的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不期而合，^①在延续了这个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从它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中获得了现实的支持和动力。

②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曾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直接推动者和始终获益者的西方国家在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时也疲于应付，单单靠民族国家本身以及冷战时代建立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各种国际组织和机制无法解决充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方位问题。要解决包括国际游资投机、国际犯罪、环境保护、人权保护、消除贫困和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与协作等在内的跨国界问题，不仅需要建立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调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协调各种利益要求，而且要培养维护全球利益的全球价值，以推动全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对于西方国家的国内来说，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最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外逃，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的下滑，这反过来推动了福利国家的改革步伐，恶化了移民与国内居民之间的关系，滋长了排外情绪，而福利制度的改革又意味着二战后确立的较为稳定的资本——劳工国家的三角关系的解体。二是国内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民族矛盾的凸显甚至激化，分裂主义、排外主义与糟糕的经济状况混合在一起，威胁着国内既有的秩序、和谐的社会关系以及民族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盛行的凯恩斯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3

①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的一段话是“趋同论”的典型表述。他说，福利国家或“混合社会”的出现“展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和典型的社会主义……在私有形式和公有形式之间作出选择……已不是一个宗教原则的问题……我要说，我们完全可以从理性的谈话中剔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字眼。”小施莱辛格等编《美国思想的轨迹》，第536页，波士顿，豪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63。

③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早在 60 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了信息化将把人类社会带进“信息社会”和“后工业社会”。80 年代流行起来的“第三波文明”，90 年代的“知识经济时代”都说明了信息化对社会变迁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技术的发展首先造成了传统产业结构的变革，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正在成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集中在信息领域，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激烈。国家不仅要调整产业结构，还要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以第二产业为基础的工会冲击很大，不仅减少了成员数量，而且分化了组织内部的和谐一致关系。掌握信息技术的“白领阶层”在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不断提高，以致于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认为未来的社会权力将掌握在新兴的“符号制造者”手中。与力量不断增加的“符号制造者”相对的是，没有技术和技术落后的工人的经济地位的下降，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终身就业将越来越少，临时工、小时工等就业方式会增多。对于国家来说，在信息时代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既不能采用传统的福利救济方法，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把失业完全推到市场那里，由个人解决，必须创造新的制度形式。

④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呼唤着新的思维和行动。西方各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资本力量得到了加强，劳工力量的集体谈判能力和国家的管制能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在这种条件下，福利制度的改革成了资本的要求。但是，福利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牵涉到各个阶层，既要保存已经确立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的

外逃，保持生产的效率和国内就业增长。对于通过竞选方式上台执政的西方政党来说，这是一种两难选择。另外，从6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政治趋势越来越突出，包括绿党、女权主义、新时代等诸多奉行新的价值取向的运动在内的新社会运动大有与正统政治分厅抗争之势，传统的左/右两分法政治判断标准无法把这些运动涵盖进去，加以制度化。这些运动不仅冲击了传统政治生活的公众基础，使政治生活更加个人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淡漠甚至丧失，^①而且也对传统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挑战，吸引了许多厌倦了乏味的传统政治的选民，导致了选举投票率的下降和政治冷淡意识的增长。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而完善起来的政党必须调整自己的理论和策略来唤起公众对自己的兴趣和支持。

⑤政治“代际”的更替为西方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变化的直接动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西方国家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繁荣”时代出生的一代现在开始在美国政坛成为主导力量。美国的克林顿、英国的布莱尔、德国的施罗德被认为是这一代人中的代表。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的突出特点是：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长大的，同时又经历了资本主义在60年代出现的深刻的价值冲突，是“造反”的一代。这种经历使这一代政治人物带有一定的反叛意识，不满传统主流政治。而按照西方的正统观念，像克林顿这样的人连一个合格的公民

① 社群主义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有影响的思潮和运动正说明了相当多的西方人开始忧虑这种现象。美国学者普特南（Putnam）通过对美国公众生活的考察提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的公民精神和积极的参与传统正在丧失，人们社会活动的方式由原来的集体参加俱乐部方式正在转向一个人“打保龄”的个人娱乐方式。他担心这种个人化趋势的发展会削弱美国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进而破坏美国的政治生活。参见罗伯特·普特南：《一个人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载《民主杂志》1995年1月号，第65～78页。

都算不上，因为他曾逃避兵役，在道德上还有缺陷。然而他们的这种经历和年龄的优势使他们更理解选民，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要求，不仅能够在竞选中提出令人激动的口号，吸引更多的选票，而且知道选民的兴奋点所在，这保证了其政策的有效性。这一代领导人虽然不断地面临了各种道德上的指责，但是在各个年龄段上都得到了支持，尤其得到了中产阶级和所谓的“X一代”（指的是从18岁到30岁的人）的有力支持。中产阶级是工党竞选获胜的决定性因素。^① 在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民意调查中，“X一代”认为克林顿可以任期届满的比率达到64%，因为他的政绩鲜明。随着西方社会中代际的更替，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年轻一代进入政坛，西方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将会更大，这对希图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等组织来说，变革是必然的。

后冷战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中出现的这一系列变化呼唤新思维和新变革，“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引起反响的尝试。

二、第三条道路：思路与举措

许多人认为克林顿是“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克林顿以“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为竞选的主题。他说：“我们必须采取的变革既不是自由主义式的，也不是保守主义式的。它是两者的结合，而且与两者截然不同。生活在城镇乡村的美国人民对左、右派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陈腐话语，以及使我们的政治代替了行动的其他言论不感兴趣。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

① 梅迪雷斯·巴格比：《为何X一代支持克林顿》，载《波士顿邮报》，1998年12月1日。

的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克林顿认识到，厌倦了两党政治的美国人需要新的刺激，如果按照民主党的传统主张来参加竞选，肯定无法击败有海湾战争胜利为支撑的布什和有许多新观念的独立竞选人罗斯·佩罗，因此，他用一种灵活的中间派自由主义取代了陈旧过时的信条，同反对他的人进行建设性交往，保持改革精神，欣然接受了 60 年代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取得的成果，灌输努力工作精神和个人责任感。^①克林顿的这些举动使他获得了美国“激进中间派”（Radical Centrist）的称号。克林顿的理论和行动在有悠久左派传统的欧洲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是欧洲的变化远远没有美国那么迅速，因为欧洲左派有严密的政党组织和理论体系，在变化面前显得有些僵化和滞后，灵活性较差，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实现了党内的理论更新和领导层的更新换代。以英国为例，在工党内部，年轻的托尼·布莱尔在 1992 年工党竞选失败之后接替金诺克成为党的新领袖。1994 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了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从 1995 年开始，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描述自己的政治哲学，表明工党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构新的思路。1997 年，布莱尔以较大优势击败保守党领袖首相梅杰，工党在度过了 30 余年的在野时光之后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政府的口号。为了阐述“第三条道路”的内涵，吉登斯在 1998 年 5 月又出版了《第三条道路》一书，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阐明了工党的新思路。同年 9 月，布莱尔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一书，详细阐发了工党的执政思想。“第三条道路”在英国得到了最全面论述。英国俨然成了“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代言人和总后

① 肖恩·威伦茨：《总统——不得人心的人》，载《洛杉矶时报》，1998 年 10 月 18 日。

方。除英国外，意大利前总理罗慕诺·普罗迪，瑞典人佩尔森（Persson），丹麦的拉斯姆森，葡萄牙首相安东尼奥·胡铁雷斯，法国总理诺斯潘和财政部长斯特劳斯-卡恩等，以及德国的施罗德都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和热心鼓吹者。围绕着“第三条道路”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团体。^①

根据各种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论述，我们可以把“第三条道路”的思路作下面的梳理。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与老左翼和右翼明确地区别开来；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拘泥于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及突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区别难以保证左翼政党获得足够的选民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左翼政党必须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要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以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地位^②；三是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狭隘片面，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突破这两种思路和模式，找到新的思路。在“第三条道路”看来，目前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

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道路”不仅成了西方政治中一个流行的术语，而且也被其他一些国家的党派借用，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创新意识和团结更多选民的取向。

② 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是克林顿以及欧洲各左翼的宏图大志，这种宏图集中体现在“中-左”（Centre-Left）和激进中心（Radical Centre）这些新词上。这些词有双重意义：第一个意义是中间派与左翼的新组合；第二个意义是在保持激进或左翼的核心价值的同时，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后一个意义主要得益于俞可平教授的思想）。

单纯是经济增长问题，而是更广泛，更深刻的问题。“第三条道路”所要做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诸多领域入手，找到一个全面医治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有四项内容。

1. 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

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虽然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发挥了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是有些矫枉过正。对个人、资本和市场的强调，实际上为它们的过度发展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基础，这相对降低了社会共同体和国家的地位，破坏了社会的团结，削弱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右翼也没有解决好外来移民的问题，福利的大幅度削减把移民推到了贫困线之下，与不断强大的资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中贫民区的出现和增多。同时执政的右翼还放纵极右翼势力的发展，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有抬头的迹象，移民和国内居民的关系紧张，冲突不断。这些矛盾使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冲突的危险边缘，破坏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连一向标榜为民族“熔炉”的美国也被人称为“大拼盘”。

“第三条道路”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加生活的社群的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理论成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的理论支柱，该理论的核心概念——“社群”（Community）成为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第二，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Stakeholders）公司理论在90年代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与